

内蒙古社会发展与变迁

主 编 斯 平

副主编 史建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社会发展与变迁》目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序)·····	斯 平(1)
坚持在稳定协调中扎扎实实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 ·····	维崧 何一兵(7)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民族工作·····	维崧 何一兵(23)
坚持在实践中开大胆探索闯出改革之路·····	维崧 何一兵(32)
自治区经济发展和系统决策·····	维崧 何一兵(49)
农村新格局发育形成中的社会变迁·····	哈丽娜(57)
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成长道路·····	哈丽娜(78)
自治区社会发展的指标化评价·····	贺学礼(92)
自治区人口迁移问题的探讨·····	贺学礼(101)
内蒙古人民生活状况发展与回顾·····	李淑珍(109)
努力实现满洲里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张 智(120)
口岸经济模式探讨·····	廖梧岗(127)
满洲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前景·····	薛贵元 王之光(144)
乌拉特前旗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调查报告·····	廖梧岗(151)
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畜牧业繁荣发展·····	李淑珍(166)
社会变迁中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心理·····	贺学礼 新文化(173)
牧民消费方式的变迁·····	哈丽娜(194)
乌拉特前旗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贺学礼(206)
乌拉特前旗农民社会保障·····	贺学礼(220)
乌拉特前旗基督教状况的调查·····	贺学礼(229)
乌拉特前旗的历史变迁·····	史建海(238)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乌拉特前旗的革命活动……………张书琛(262)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乌拉特前旗的政治运动

……………张书琛(26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乌拉特前旗的政治运动

……………张书琛 师 锐(282)

乌拉特前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张书琛 师 锐(304)

改革开放时期的乌拉特前旗……………史建海(32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族地区

——《内蒙古社会发展与变迁》序

斯 平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讲过：“内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这个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悠久，丰富多采，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全区各地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存所在皆是。勤劳智慧的先民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创造了“大窑文化”和“河套文化”，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又创造了“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和“扎赉诺尔文化”。从遥远的古代开始，汉族、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为开发内蒙古，参与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作了不朽的贡献。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摇篮，是游牧民族生活和创造的历史舞台，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学家，内蒙古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历史宝库。

“往事越千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行程，内蒙古地区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经由不同的途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蒙古族是从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飞跃的。鄂伦春族和一部分鄂温克族则是从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原始共

产主义社会末期,超越几个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发展和变迁使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志于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仁人志士,内蒙古无疑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塞外风光粗犷雄伟,别具特色。这里宝藏遍地,物产丰茂,经济潜力雄厚,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内蒙古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有闻名遐邇的“塞上粮川”和“谷仓”,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位,有“绿色宝库”之称的大兴安林林区,有以包钢为龙头的钢铁、稀土、机械、电子为主的工业体系,各种矿藏资源极为丰富,人们据此把内蒙古的富饶概括为“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资源”。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今后很可能处于领先地位,问题在于内蒙古本身要发展起来。这是对内蒙古地区的殷切期望和有力鞭策。也说明内蒙古发展潜力巨大。现实的相对落后和今后可能处于领先地位是一个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大矛盾,有效地发挥潜力,使内蒙古尽快发展起来,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任务。

内蒙古本身要发展起来,要加快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逐步改变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同全国的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迎头赶上,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处于领先地位的期望,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一系列艰巨的工作,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与自治区的区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与自治区区情结合起来,把党中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内蒙古地区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的高度,从而使两者的

结合也达到了新的历史的高度，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有了巨大的发展。

我们当前面临的战略任务就是在2000年前的十年中努力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发展过程，要求两个文明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飞跃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进步。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社会问题成堆，社会发展危机重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我们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如何，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在经历几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发了对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特别是象内蒙古自治区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一方面人们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的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方面，自治区城乡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化的速度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和条件比较差，科技教育还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都很不完善，特别是人口控制问题，充分就业问题、资源能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问题，一些地区污染严重，土地沙化、生态恶化等环境保护问题突出起来，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两方面的巨大反差反映出我们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相对落后的状况。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经济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的问題，如

何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素质提供支持的问题。实践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搞好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关系，搞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搞好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此，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与自治区的区情，包括自治区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认真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采取有效措施，使民族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同步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研究上有所作为。《内蒙古社会发展与变迁》这个课题就是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探讨。

研究内蒙古社会发展与变迁，当然不能不研究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形成了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同时还依据法律，享有少数民族特有的权利。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特殊的照顾。目前国家每年对少数民族地区8个省、自治区定额补贴就近80亿元，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决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把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同全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强调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在今后发展中给予民族地区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这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无论在本质上或形式上都是真正平等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要求逐步消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内地发达地区发展上的差距，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应当指出，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90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总产值达到2841亿元，比1980年翻一翻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内蒙古自治区牧民人

均年收入已进入全国农牧民人均年收入的前列。我们党和国家为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从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缩小和逐步消除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上的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方面的主要矛盾，是民族问题方面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的问题。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新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离开这个主要矛盾。离开缩小和消除发展差距这个主题去谈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就会迷失方向。江泽民同志最近进一步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1991年12月）应当看到，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差距，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差距有所扩大，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缩小以至消除民族地区和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有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只有让沿海等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尽快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才能较快地增强，也才有可能为帮助民族地区的发展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因而不可能人为地放慢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以求消极平衡，而是要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加速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以加倍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全国的发展相适应。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只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立足点放在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上，就一定能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达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

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就内蒙古自治区来说，我们应当发挥我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边境线长，边贸口岸和过货点多的优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内引外联，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沿边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这样一个颇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是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需要我们善于从实践出发，探讨内蒙古自治区在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地区发展道路的 内涵，为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我们课题组人力不足，水平有限，这个集子只是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有关问题的探讨也还不深入、不系统。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提高。

1991年12月

坚持在稳定协调中扎扎实实地 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

——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之一

维 崧 何一兵

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多年来，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平等互助团结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从农村牧区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入了自治区建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四十多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二五”期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使经济建设出现大起大落，“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动乱的破坏，由于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影响而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三起三落，都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来反思，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和自治区区情，超越国力和自治区经济实力，忽视条件，急于求成。这是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

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掌握国情

掌握国情是指导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曾经过长期的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理论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和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后来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邓小平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这种“左”倾错误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就是超越国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为只要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就会在短期内创造出农业、工业增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奇迹；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误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比较短暂的初级阶段，从而急于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积极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表现在发展战略上，就是盲目冒进的赶超战略，认为中国建设可以超高速发展，短期内可以赶上美国超过英国，摆脱落后状况。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就是建立在赶超的经济理论和战略思想之上的。1958年甚至提出“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足见当时头脑是何等的不清醒。应当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力争实现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当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就是

错误的，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许多同志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势头，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八届二中全会据此制订了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从此党内不同意见就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

“左”倾错误思想得以在党中央领导层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得以发生，以高指标、瞎指挥和“共产风”为标志的

“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农业上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上宣传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到处搞翻番。唯意志论成了时髦，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条件攻之为所谓“条件论”而加以批判，使我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以后一段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毛泽东1962年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828，827页）经过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头脑比较清醒了。

但是，当时经济发展问题上“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以至最后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十年动乱的结束并不等于“左”倾错误也随之结束。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在开始使国民经济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同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多次号召要“大赶快上”、“开足马力，

挽起袖子大干”，并且提出了一个盲目冒进的“十年规划”，还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大搞“洋冒进”，出现了第二次“大起大落”，使经济建设又一次受到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从此，我们党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掌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邓小平提出，经党中央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我国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充满活力，蓬勃发展。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要采取三步走，即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用50年时间，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战略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国力条件而制定的，体现了量力而行、稳步前进的思想。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把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二大和十三大的发展战略同过去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盲目冒进的跃进战略，赶超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十三大所确定的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1985年后经过反复考虑提出的，它从指导思想上，引导我国经济建设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在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在取得几年加速发展

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过失误。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十二大后，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关于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理顺关系、打好基础，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不同意。他同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讲高速度高指标，要求提前翻番，争名次。他还强调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头。从而导致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对此又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了所谓“软着陆”的主张、结果，不但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的现象反而继续发展，问题越积越多，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引起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而扭转了局面。（参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及其后变本加厉的发展说明：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指导思想不端正，在具体指导上仍然可能发生失误。而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又是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分不开的，这也说明，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急于求成的倾向，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必须认真对待，从指导思想上切实加以纠正。现在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综合各方面的条件，我们的思想应更解放一点，胆子应更大一点，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当然这不是鼓励急于求成，不是追求脱离国情的高速度。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经济建设，都要切实防止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慎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这

样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真正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时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文选》361—362页）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失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这种失误，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强调：“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国四十一年经济建设正反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体现。全党同志务必时刻牢记，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努力避免经济生活中再次发生大的波折。”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各个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强大的经济基础，但是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名次还很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从这样的国情出发，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过快，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在经济上赶上、超过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求成，势必欲速则不达。赶超发展战略是脱离我国国情，超越我国国力的。我国经济发展只能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国每年积累的能用之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是有限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

尤其如此。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盲目冒进的赶超论是没有根据的，速胜论的思想是脱离实际的，稳定、协调的方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当然，我们坚持的稳定协调的方针不是提倡在经济工作中四平八稳、不去争取实际条件许可的高速度，坚持稳定协调的方针并不排除在一定时期，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稳定协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是为进求稳，稳中求快。稳定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从民族地区的区情出发，必须坚持“稳进论”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底子薄、基础差，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区内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与沿海内地比较发达的地区比较仍然还有相当的差距。当然自治区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发展经济有很大潜力，但是，要把这种潜力变为现实的经济实力，也需要经过持久的努力，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是自治区的基本区情。从我国国情和自治区区情出发，自治区经济发展更要强调量力而行，稳步前进，而不能超越国力和自治区的经济实力，急于求成。早在1950年5月政务院举行的院务会议上，当时担任中央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乌兰夫在关于当前民族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方针，稳步前进。一切急性的作法，必会犯严重的错误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乌兰夫的报告。过后不久，周恩来把“慎重缓进”改为“慎重稳进”，并作为民族工作普遍适用的方针确定下来。经周恩来的修改，这个方针的提法就更准确了。因为一切取决于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稳是为了进，要着眼于进，立足于进，一旦条件许可，我们总是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正是

慎重稳进的方针题中应有之意。以乌兰夫为书记的自治区党委，从民族工作的实际和自治区区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使自治区的各项工作都得到顺利发展，从自治区建立到“一五”计划的十年间，在胜利完成各项社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自治区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1956年与1946年比较，工业总产值增长27倍，粮食总产量增长1.5倍，达到465.5万吨，各种牲畜总头数增长2倍多，达到2900万头（只）。到1957年底，自治区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即“一五”计划前一年增长2.93倍，年平均递增31.5%，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5.26%，年平均递增2.7%，1957年粮食因特大灾害而减产，但整个“一五”期间，年平均产量比1952年仍增长6.7%，1957年畜牧业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牲畜总头数仍然比1952年增长42.21%，各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展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二五”期间，由于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的干扰，工业大起大落，年平均递增速度比一五期间降低18.2个百分点，全民办工业、大炼钢铁、机械工业全面开花，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造成极为严重的浪费，对重点建设项目造成严重的冲击。农业方面，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到1962年下降到33.55亿公斤，低于1952年的34.85亿公斤，倒退了十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畜牧业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二五”期间仍然持续稳定增长。1953年12月在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召开的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同志就提出，由于畜牧业“在民族特点、生产特点、工作基础等方面”有很多区别于农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是我们在考虑进行畜牧业改造时，采取有别于农业的步骤、方式方法的根据”。为此他提出在对个体牧民经济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牧主经济的改造采取类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由于充分注意到内蒙古畜牧